

狄考文西学译论研究

李东

(皖南医学院 外语教研室,安徽 芜湖 241000;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美国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狄考文的西学译论,包括《圣经》翻译译论和科技翻译译论两个部分;其中,《圣经》翻译译论源于其翻译标准和官话译语选择等的论述,科技翻译译论则见于其数学教材编译相关论述和科技译名标准的订立等。狄考文的西学译论,与其在新士教育和汉学教育中的全面教育和方法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关键词:狄考文;《圣经》翻译;西学翻译;西学教育;汉语教学

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6-0118-03

狄考文(C.W.Mateer)为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于1863年抵华。其翻译事业涉及《圣经》官话和合本的修订工作和数学教材等多个方面,此外他还编译有《官话课本》等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书籍。从其翻译实践来看,狄考文的翻译经历,代表了诸多著名来华传教士的翻译经历。从其教育事业来看,狄考文夫妇抵达登州后不久,就着手创办登州文会馆,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而登州文会馆的课程体系主要由《圣经》相关课程、中国经典相关课程和西学课程三部分组成。在从事教学工作期间,狄考文参与到《圣经》翻译、科技翻译和《官话类编》编纂等翻译环节中,因此,狄考文的译论建立在教育事业基础上,又服务于教学实践。狄考文的《圣经》翻译和西学翻译译论都植根于教育,受到了来华前辈传教士的影响,但作为晚清后来华传教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社会西学接受程度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了解与日俱增,当此之时,旧有的传教经验已然不能适应变化日益剧烈的中国社会,因此,其译论又是对过往传教士译论的扬弃。

一、狄考文的《圣经》译论

作为《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委员会的主席,狄考文因《官话课本》深受委员会代表们的信任,是为数不多坚持到《圣经·新约全书》初稿完成的修订者之

一。起初,因登州文会馆的工作实在繁忙,狄考文还在犹豫是否要接手这项工作,但犹豫再三后,狄考文最终还是投入到了《圣经》翻译中来;同样,他也带来了针对和合译本翻译目的较为成熟的思考。他明确指出,这一版《圣经》译本要区别于文理版,因为《圣经》最终是要讲给听众听的,适合于学生学习的,听者能够领会意思是第一要务,因而该译本的基本翻译原则是用词要浅显,表达尽量口语化,要简明扼要,注重连贯,既要让中国人读来如同自己的民族文本,又要避免低俗用语和方言。此后,随着译经工作的深入开展,狄考文在发表于《教务杂志》11月刊的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一文中,全面梳理了翻译难度、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描述了其更加成熟的《圣经》翻译译论。在狄考文看来,《圣经》汉译的难度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圣经》的义理和观念并不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中,故在翻译时没有可以借鉴的词汇。对于这一困难,狄考文坚定地认为,过去的译经者都比较保守(他们认为设立新词会产生意思上的误会),而如今新词伴随着西学传播大量涌入汉语中,新颖的宗教概念和表达也会很快传播开来并被人们所接受,因此保守的译名并不适合社会现状,相反新词的订立却迫在眉睫,加之《圣经》译本的文本忠实性要高于其他译本,这也使得《圣经》汉译特别困难。其次,有

收稿日期:2018-07-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40035)

作者简介:李东(1986—),男,广东深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来华传教士翻译史研究。

关译语难度一直难以为广大受众接受的问题。对此,狄考文一方面批评了过往汉译《圣经》的译语过于深奥,以至于无法让广大群众接受;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官话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极其有限,中国社会方言繁多,发音各异,但他同时也看好官话的前景,认为官话将向雅俗两端不断自我壮大。虽然罗列了《圣经》中译本在诸多方面的困难,狄考文却对完成忠实且行文流畅的中文译本信心十足。他首先强调了严格按照原文翻译而不加藻饰的重要性,接着援引来自中国的翻译助手对于“中国人能够理解和欣赏隐喻”^{[1](P608)}的观点,对原文在译语中忠实再现且不加藻饰的翻译原则给予了认可。

从狄考文《圣经》译论提出之源头来看,其既有对过往译论的继承,也有结合其社会实践的再思考。19世纪来华传教士第一人马礼逊也提出过类似的译论,主张以雅俗共赏的语言进行翻译。鉴于当时中国士大夫过雅的语言和普通百姓过俗的语言隔阂颇深,因此,马礼逊在《圣经》汉译时,做了许多大胆的语言改造尝试,试图争取更广泛的读者,但因为其译笔求新和传播土壤的贫瘠,最终产生了既不雅也不俗的《圣经》中译本,反被后来的译经委员会数次批评。而狄考文基于《圣经》提出的译论,一方面继承了前期的译论成果和翻译实践积累,另一方面也顺应了西学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并不断扩大传播的社会现实。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当时之晚清因西学源源不断涌入国内,官话逐渐代替了晦涩难懂的文言,为世人所接受且不断发展起来,因此用官话翻译《圣经》不再是马礼逊以来摸索期的产物,而是大势所趋。从狄考文个人的来华经历来看,其来华之初是以发展教育事业为其人生追求的,因此,其翻译观与其在中国长年累月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狄考文的教育务实且有创见性,这也影响了其《圣经》翻译务求白话的翻译观。

二、狄考文的科技译论

狄考文的科技翻译成就,是其为中国学生和读者翻译(编译)的数学教材《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和《代数备旨》,以及一部关于科技术语的《英汉术语手册》。因此,其译论也是由点到面地始于数学教材编译,而成于西学译名体系的建立和译名翻译标准的订立。

从数学教材编译这一点来看,狄考文的数学教育在登州文会馆的教育体系中贯穿始终,教学实践为他积累了大量成熟的数学翻译经验,进而促成了

其数学翻译译论从早期的初具创见性,到后期西学译名工具手册系统性的成熟过程。早在1875年的《笔算数学》一书中,狄考文就颇具创见性地使用了阿拉伯数字和诸多数学符号。此举不但使数学概念的表现更加准确,也节约了书写时间。虽然一度和傅兰雅在引入阿拉伯数字的问题上产生过意见分歧(傅兰雅极力反对在中国引入阿拉伯数字),但狄考文站在全球数学教育的视野高度思考中国数学教育的未来,认为没有统一的数学体系就没有良好的中国数学教育。此举仅是狄考文数学教育之精思的一个方面,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数学教育之弊端,在于中国传统数学著作“文义深沉,令人难解”,或因学理“精微”而不能“阐明”,或因学理“浅近”而刻意追求“深奥”,因此,狄考文的《笔算数学》“以解明法中之理为贵”。^[2]而在《形学备旨》中,狄考文也独树一帜地使用“形学”代替了“几何”。在该书序言中,狄考文严谨地界定了该书的学科范畴,认为“几何之名所概过广”,不仅包括了“形学之理”,亦包括了“算学各类”,而狄考文所著之书仅“专论各形之理”,因此名曰“形学”。^[3]

以数学教材编译为始,狄考文的翻译事业逐渐拓展到科技翻译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英汉术语手册》的编纂任务。由此,其科技翻译译论日趋系统化。在科技翻译中,译名之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傅兰雅就曾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言及有关译名的三条准则:沿用华名,设立新名和中西名目字汇。^[4]在《英汉术语手册》中,狄考文的译论就是在此译名准则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的。他认为“大量的术语词汇是成功教授中国人西方科学的必要条件”,据此,他对译名标准提出了更加成熟的见解:一方面,译名应以简为美,即译名的表述力求简约,这是狄考文基于西学翻译现状的思考,因为西学译名越来越庞杂,一个概念多个译名,译名冗长,极易造成使用混乱;另一方面,译名应以准为美,即译名应表意准确,只有在无法找到意思对等且简约的译名时,他才主张音译。在该手册中,狄考文便以此为标准,以英文字母顺序兼顾专业范畴为排序原则,针对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学、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药理学、解剖学、神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法律、机械制造、哲学等五十余种学科分支术语,或罗列其下义词,或罗列其常用词组,并以术语概念表达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接受性(通俗性)为依据,将已有多个译名的科技术语先后排序。由此,狄考文尽可能全面地梳理了各学

科术语的已有译名,实现了各学科术语译名的条理化、标准化。

三、狄考文译论本源:寓教于译

如果说狄考文和其他来华传教士译论的共性是对过往来华传教士译论的扬弃,那么,狄考文译论的个体性,则来自于他不断成熟的教育观。因此,欲深入了解狄考文的翻译观,就必须了解他的教育观。

首先,从其新学教育角度看其译论本源。狄考文对中国学生实施的是全面教育。狄考文于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教育理念,主张中国学生应当获得“中国语言和文学、数学、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真理”^{[5](P475)}等各方面的知识。狄考文所实施的全面教育意义有三。其一,旨在培养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使其能适应中国社会,以及与士阶层打交道。其二,旨在培养新士。狄考文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无法提供实的教育,即有利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基础性教育。其三,旨在传播教义,使学生不断理解基督教的精神品质,并不断吸收教徒。在发表于《万国公报》的《振兴学校论》中,狄考文对中国教育有过如下评价:“观中国为学之规,第能使人长记性,鲜能令人长心思。”^{[6](P8351)}而在狄考文看来,把握中国学生思维之匙就在于算学。因此,在当时数学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的时期,他便自己编译算学形学教材,边教边译,教译结合。其相关译论即形成于这一过程之中。

其次,从培训新来华传教士角度考察其译论本源。狄考文曾在《写给新传教士的建议》一书中,阐发了语言学习对于新传教士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传教士不能仅仅囿于学语言,而应精通语言,因为语言能力是传教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由此,他提出了学好一门语言的四条重要原则:全勤投入,勤加练习,善于辨音,规律记词。要想很好地掌握一门语言,就需要传教士们在布道、教学、翻译或著书等社会活动中反复操练。事实上,这也正是狄考文研习汉语的方式和途径。狄考文注重的不仅是学习汉语的方法技巧,更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理念。这体现在其为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所编写的《官话类编》等系列汉语学习教材中。晚清时期,《官

话类编》与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在汉语学习英译教材中影响力最大。《官话类编》借鉴了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语言自述集》的部分内容,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汉语知识,涉及语音、词汇和文化知识介绍等。基于《官话类编》,狄考文还先后出版了《官话类编(删减版)》《官话简明教程》。这些教材都成为新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重要教材。这些教材贯穿了狄考文重实用重方法的教育理念,所举例子大多为官话口语表达,翻译时虽时有理解错误,但总体来说翻译方法灵活,通顺易懂,内容编排充满巧思。如在《官话类编》的第115课中,关于“一展/转/眨眼”的翻译,狄考文用直译法将其译为 in the opening of an eye(一展眼)、In the turn of an eye(一转眼)、In the wink of an eye(一眨眼),并将这三组词同时意译为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7](P323)}正如狄考文在科技翻译中强调概念的理解一样,他的《官话类编》始终都贯穿着这一思想,即使学习者在大量真实平易的口语化语料中,体会汉语字词意义和运用的灵活多变。

综上所述,狄考文的译论既是来华传教士译论的缩影,即在前期来华传教士译论基础上的扬弃,又是其基于不断成熟的教育事业而逐渐成熟的个人特色译论,即将发展中国教育事业作为其毕生追求,为不断夯实全面教育的土壤而译。由此而言,狄考文的译论,是在继承前人翻译成果和个人教育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的,顺应时代变化的富有特色的译论。

参考文献:

- [1]C.W.Mateer.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J].The Chinese Recorder,1908.
- [2](美)狄考文.笔算数学[M].上海:美华书馆,1898.
- [3](美)狄考文,邹立文,刘永锡.形学备旨[M].上海:美华书馆,1905.
- [4]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J].格致汇编,1880(3).
- [5]C.W.Mateer.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90 held at Shanghai[M].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
- [6](美)狄考文.振兴学校论[J].万国公报,1953(14).
- [7]C.W.Mateer.Mandarin Lessons,Based on Idiom[M].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0.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